

債到信用的轉化：西方金融史中技術知識到社會知識的形成

陳介玄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

一、前言

西方金融史的發展，是一個千年技術知識與社會知識辯證發展的過程。在這個過程，西中方展現了國際金融在全球的支配力。本文想要探討的是，這個金融全球支配力發展的內在機制。由於金融本身的特質，是一個高度工具性，卻又是極為制度化安排的產物，是以，金融工具與其他經濟領域的工具，具有本質上的不同，金融工具除了具有相當強的技術知識屬性，卻也有非常重要的社會知識屬性。金融社會學的發展，雖然已對各種金融市場及風險的議題進行探討 (Cetina & Preda, 2012)，卻尚未能研究這個金融史中的重要問題。任何產業的發展，當然離不開技術知識的導入與累積，是以，技術知識就涂爾幹所指出的專業分工社會而言，是極為重要的一個要素 (Durkheim, 1984)。技術知識構成了工業社會運作的基礎。但是，在金融產業的發展過程，我們卻看到了跟製造產業不一樣的圖像。金融產業的發展，一方面要仰賴如製造產業一般的技術知識的創造與累積，另一方面，與製造產業不同的是，金融產業更需要社會知識的支持。從西方千年的金融史來看 (Michie, 2008)，金融產業技術知識與社會知識的逐漸匯流，構成了西方的金融文明，產生了一系列技術知識與社會知識互為建構的金融創新，這是西方金融支配力之根源所在。

從 Michie 所討論的全球證券市場發展的千年歷史來看，全球證券市場的發展在千年前，從威尼斯城邦開始即是一個跨國界的金融市場。在這個跨國界的證券市場發展過程，技術知識發展的軌跡歷歷在目 (Michie, 2008)。但是，順著金融系統發展的社會知識卻隱而不顯，逃過了眾人的耳目。一千年前的英國，如何從社會底層開始改變經濟生活中的金融會計的記錄形式 (Clanchy, 2013)，長程貿易所需要的大量資本，如何透過對於商人付款的記錄，形成有效的一套商業信用評等系統 (Olegario, 2006)，經由貿易網絡的全球建置，英國如何建構出一個有競爭力的信用經濟 (Poovey, 2008)，支配當今所有金融交易的評等公司，像標準普爾和穆迪是如何出現的 (Sinclair, 2005)，這些都是金融史發展中容易被忽略的社會知識。因而，我們可以從西方金融史發展過程，看到一條搭配著金融發展的社會史，亦步亦趨的配合著金融的腳步前進。從記錄的形式、心態到信用經濟的文學建構，形成了一個金融發展過程中的社會整體性，使我們不能任意切割，技

術知識與社會知識在金融產業的發展。

在西方千年金融史發展過程中，最重要的轉型來自於英國的金融革命（Carruthers,1999; Dickson,1993）。在英國十七世紀所啟動的金融革命，過去我們已有不少的討論（陳介玄,2012,2013）。本文要探討的重點在於，英國金融革命中所推動的「債」到「信用」的轉化，是西方千年金融史發展過程中，極為重要的歷史轉折點。在這個轉折點，我們看到了金融技術知識，與社會知識的互為建構，變成一個金融史上的創新。透過英國公債市場，Michie 所提出的全球證券市場的發展，不但被強化，而且形成一個支配全球的信用經濟。因此，十七世紀英國所啟動的金融革命，不但在資本市場上進行制度的創新，更使西方信用經濟的發展，達到了一個人類史上新的境界。從債到信用的轉化過程，我們看到了金融創新的本質，是一個技術知識和社會知識交織的產物。沒有社會知識的開展，純粹技術知識，不足以構成金融的創新。這是本文所要提出的觀點。底下我們將從全球證券市場的千年發展談起，說明債到信用轉折的歷史基礎，西方金融文明，如何從千年的技術知識與社會知識的匯通，形成全球的支配力。

二、證券市場的全球化：信用經濟的歷史基礎

從歷史來看，證券市場的全球化發展恰恰彰顯出一個不易察覺的事實，金融的技術本質是跨國界的建構。這使的我們對於這個全球證券市場發展的瞭解有其困難。Michie 在全球證券市場發展的研究說明了這個事實。他從長歷史、全球的視野來看證券，清楚展顯了西方證券市場發展的歷史獨特性。這個歷史獨特性使我們在了解之時。在知識上，非常難以用過去的概念，精準的掌握證券市場。因為，當一個歷史實體，不能在國家邊界制度內界定，而是在全球空間內界定，我們的知識參考架構，便不能是國家，而是一個更寬闊的國際架構。所以，Michie 才會指出，建構這些全球證券市場的行動者，是在威尼斯、布魯日、安特衛普及熱那亞，不同城邦之間遊走的商人（Michie,2008）。從這些遊走在各個城邦國家之間的商人，我們看到了全球證券市場發展的軌跡。透過這些行動者的商業活動，一個超越單一國家政治、經濟、社會及文化力量的多重建構，附著在一個特定的空間茁壯。

Michie 指出真正的參與者是跨國的商人和金融家，在城邦國家的時代，1100-1500，乃至於 1700，只有國際商人和金融家才能瞭解證券市場。在布魯日，威尼斯，熱那亞，安特衛普，到阿姆斯特丹，是在國際上遊走的一群人。他們知道要什麼！所以，一開始西方證券市場的發展就是全球性(global)！這個全球性，我們一定要掌握到的！否則很難了解證券市場的完整性。全球的證券市場在一千

年前，從地中海慢慢醞釀出來獨特的金融的平台。這是證券市場的本質(essence of the security market)。其次，要再深入探討的問題是，為什麼要談一千年？Michie 要告訴我們的是，這個市場絕對不是在單一國家疆界發展出來的產物。因為這個市場跨國際的本質，每個城邦國家只參與一小段的歷史過程。每一個地方，從威尼斯、熱那亞、布魯日、安特衛普及阿姆斯特丹給它一點養分。這一千年的歷史，說明證券市場是一個多文明聚合的產物。這個證券市場沒有從一個全球的(global)千年的歷史視野，就看不到它是多文明聚合的產物。為什麼要談一千年？在時間的縱軸中才知道，西方所開展出來的證券市場，並不是任何人可以複製的。因為在多文明建構的過程中，有威尼斯、熱那亞、安特衛普、布魯日，乃至於阿姆斯特丹，每一個階段所給予它養分，每一個地方給它文明，所以這群關鍵參與者順著這個全球的(global)舞台，不斷在轉換，不斷累積它的能量。Michie 要談一千年歷史，他要告訴我們證券市場是多文明聚合的產物，從這千年的歷史過程中，才有辦法發現。證券市場在長歷史中，慢慢聚合這些文明，形成所謂全球證券市場的實體。

第三點，這些關鍵參與者(key player)不管是長程貿易，或是國際金融的商人，為什麼需要這個市場？為什麼威尼斯、布魯日、熱那亞、安特衛普，需要這個證券市場的存在？Michie 在前兩章說明，這個證券市場，並不是所謂政府因為要發行公債而形成的。他說明商人做生意之時，一定有閒置資金，也有一端是需求資金。例如：做長程貿易的商人，在伊比利半島，地中海的沿岸，進了一批酒。賣掉以後，有一百萬美金要做什麼？威尼斯城邦，為了和熱那亞作戰，需要海軍，資金需求是一百萬美金。當初做貿易和金融的一批商人有閒置資金，而城邦國家有資金的需求，這兩端如何連接起來？需求資金的國家，來借閒置資金，這不是供需很很好的整合嗎？如果城邦國家要向有閒置資金的商人借錢，要付出一定的成本，約定 5% 的利息，那用什麼形式借錢？設計一個債券，用債券給你購買，付你利息，就解決了。很多閒置資金，就跑到債券來購買。因為長程貿易商人一年的資金不用，可以有 5% 的收益。這個錢就不是閒置的。一百萬美金可以做什麼？在還沒進第二批酒之時，就可以拿 5%。所以，就有 5 萬塊美金的收入。這是 Michie 所指出千年前重要的故事。可是商人手中的閒置資金，不一定是貨幣。可能是匯票(bill of exchange)。匯票可能是伊比利半島商人給的，匯票放在手中也沒有利息。匯票能不能和債券掛勾？商人可以透過貼現市場來和他掛勾，投入威尼斯城邦所發行的債券。所以，Ranald C. Michie 告訴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金融運作歷史源頭 (Michie, 2008)，在資本主義上層的這些商人們，在金融技術的操作上不斷創新。因此，透過貼現市場，商人手中的匯票，以及閒置資金和城邦國家(city state)的資金需求，就媒合起來了。這就是作者指出證券市場發展起來的重要性。這和今天金融市場運用的本質沒有太大的差別。只是今天的技術越來越精巧而已。

證券市場既然是全球的，從我們的研究可以看出來，這個市場和全球金融核心中的貨幣市場、貼現市場以及外匯市場是結合在一起的。在跨國界的證券市場之發展，一定有行動者持有財富形式轉化的問題。所以，對 Michie 而言，這幾個市場是和證券市場結合在一起的。這就能解釋，為什麼我們一直認為，討論金融模式是英美的市場模式，還是德國和日本的銀行模式，沒有太實質的意義。因為在最高層次的國際金融，金融市場具有一定的整合性，市場模式與銀行模式是整合在一起的。是以，從歷史來看，最重要的是低階金融與高階金融的分野，高階國際金融兩者是整合的，低階國家金融兩者是分開的。例如，上述所言，在貨幣市場的閒置資金，如果能和債券結合，債券本身作為資本市場。這些金融活動的完成需有銀行的中介與交割，同時也會有各種相關金融市場運作的參與者，像經紀商和造市者的存在 (Abolafia, 1996)。所以，我們將歷史的縱深拉開之後，將很多歷史現象整合在一起。看到今天很多市場被分開討論，有其知識上的侷限性。其實，就歷史上全球證券市場的發展而言，本身就有整合性。我們所看到的國際金融這個整合性，是極為重要的歷史觀點，從這個角度我們看到的表面分開的各個金融市場的發展，而是整合在一起的不同金融市場在技術發展上的融合與互相支援。

最後我們探討全球證券市場的發展，如何變成西方信用經濟的基礎。這個問題牽涉到，國家跟社會要把這證券資產成是財富的表現形式，如何而可能？證券市場，它很重要的職能是把所有的資產，特別是所有的重資產加以證券化。換言之，今天一個國家，最重要的職能，就是要去形構一個全球投資人都接受的證券市場，當成他們的財富場域。也就是說，一個技術成熟的證券市場有能力把各種重資產加以證券化。不管是運河，鐵路、鋼鐵廠、石油煉製、製造業也好，通通能夠把它加以證券化。在整個十九世紀，我們會看到工業革命成熟階段的時候，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，這個證券化(securitization)是一個社會化(Socialization)的同步過程。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它也在證券化。為什麼我們在這裡談在社會化的過程呢？因為證券市場是一個社會建構的過程，它不會只是金融的建構，它是一個國家的力量，經濟的力量，文化的力量。所有的力量的匯集點，使得它能夠產生出成熟的轉換資產的制度。經過千年社會化及證券化的發展過程，全球形成了一個國際金融的實體，這個實體超越了城邦國家及民族國家的主權邊界 (陳介玄, 2013)，使布勞岱宣稱的資本主義有附著的場域，並孕育出西方獨特的信用經濟。底下我們將從債到信用的轉換來討論這個金融內在機制的發展。

三、債到信用的轉化：西方信用經濟的形成

千年證券市場發展過程，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出現於十七世紀英國的金融革

命。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可以探討這個革命的歷史意義。從本文的研究來看，一個極為重要的歷史意義乃在於英國透過金融革命，形成的信用經濟。

債(debt)在哪個範疇運作？1.道德生活範疇；2.經濟生活範疇。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，這個運作，有可能是在道德生活的範疇，也有可能是在經濟生活的範疇。中國在哪一個範疇呢？債表彰為經濟的活動跟行為。可是，中國社會在文化生活中我們會把它放在道德生活的範疇。為什麼把債它放在道德生活的範疇呢？當一個小農的均貧社會，整個社會沒有多少的剩餘。在這個前提之下，要用道德來規範秩序的時候，債這個東西變成其中很核心的要素。用道德生活來規範它，可避免風險的產生。其次是債的治權力結構，這也是中西不同很關鍵所在。那麼，債的政治權力結構是什麼呢？債的政治權力結構有兩個層面：1.債務人與債權人不及於權力上層；或是2.債務人與債權人是政治權力的對等方；前兩者不同，政治權力對債的法律界定即不相同。在文明發展的過程中，有一個非常值得我們審思的問題是：債務人跟債權人的相對關係。背後隱含的獨特政治權力結構，是我們在宏觀層次上，較少去注意的。例如，皇權，皇帝可不可以當債務人？中國沒有這個觀念。可是，西方從威尼斯的城邦一直的到十五、十六世紀西班牙王國，到民族國家的英國，債務人是國家，是一個皇權。所以，它及於權力的上層，債的整個權力、政治權力結構，就完全不一樣。這個政治權力結構不一樣，會影響什麼？

如果政治權力對於債的法律界定，是債不及於權力的上層。換言之，一個國家不容許它。代表整個對於債的政治權力結構，它有一個較負面的界定。這會形成了我們社會將債放在一個道德範疇、道德生活中，比較不被鼓勵的金融活動。從俗民生活到上層的廟堂世界，如果都這樣，那這個社會對於債的觀念將會是保守與負向。可是，西方恰恰相反走一條經濟生活範疇的發展，債變成是經濟生活裡的一個工具和一個手段。從生活到政治權力結構，要回到文化的界定問題來。文化界定這一個問題，非常值得我們注意。文化對債的界定有兩個層次是我們要注意的。1.共同建構債的正當性；2.債的記錄(debt record)、信用的記錄(credit record)。第一個，共同建構的正當性。這是一個 Carl Wennerlind 在他的《Casualties of credit: the English financial revolution, 1620-1720》一書提到英格蘭之時，他講一個重點。信用這個概念，就是債這個觀念，在整個社會慢慢被建構的一個過程（Wennerlind,2011）。有點像 Timothy Sinclair 在《The new masters of capital》一書提到，信評公司其實是一個歷史建構的一個過程（Sinclair,2006）。共同建構債的正當性出現以後，有一個東西就變成非常重要的發展了。是什麼？債的紀錄。也就是信用的紀錄。這是西方金融文明中非常獨特的地方。你跟人家借錢，這就是一個債的紀錄、信用的紀錄這件事情，怎麼可以在一個文化生活中，被當成是正當的一件事情。我們把它塗抹、塗銷掉，都來不及了，更何況西方是：要把你永生不息把你記錄下來，還有永續債，你知道嗎？從債的紀錄跟信用的紀錄，這件

事情來看，它沒有文化給它一個共同建構債的這個正當性，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從債的日常生活到債的記錄，以及從道德生活範疇過渡到經濟生活範疇，和在政治權力結構的位置，都說明了債轉折到信用重要的社會過程。

長期的信用紀錄構成一套獨特的知識，很多的知識我們是發展不出來的。如果你把二十年你跟人家借錢的歷史，把它紀錄下來、鋪展出來，你會不會看到什麼東西？如果一個人、公司，或是一萬個人、一萬個公司通通把它二十年來付款做成一個紀錄的時候，會看出什麼東西來？我們會看出，我們過去根本不懂的、不知道的這一種知識。這個知識不是那麼簡單。它沒有韋伯講的，一個生活的親近性無法產生。如果是在道德生活的範疇裡面，如果是在中國政治權力結構裡面，對債的法律界定及文化界定，通通與西方不同，也就無法產生一套信用記錄的知識。標準普爾、穆迪評等公司的存在，即表明了這種知識有了紮實的社會基礎。

長期信用紀錄的知識，它會構成一套文明。這一套文明，對中國人來講，東方人來講是陌生的，因為我們等於是用一套人際關係來取代它。在這個地方，我們很容易用人際關係，來替代一個文明系統的發展，使得我們在金融上，一直停留在俗民的層次。譬如，我們二十個人，一百個人，可以進行標會(陳介玄,1995)。可是，要上升到國際，這一套人際脈絡就不管用了。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差別，那麼長期信用紀錄這種知識，構成了一套文明之後，即有更強的創新能力。我們會看到，這個信用紀錄的知識文明，它支援了更多的金融創新，這是我們看到評等公司出現的理由。一個人治社會，不只是權力人治，在很多日常生活中的習慣，是透過人際關係來消解掉我們必須要做紀錄的功課。所以，某個角度來講，我們要累積出一個系統的能量，其實是比較薄弱的。這是一個文化人的特質，韋伯在他的社會科學方法論，講得最徹底的就是：現代社會人是一個文化人。這一個文化人，涵育在社會中，自然會受文化，形塑出個人的一套習慣、思維和行為。所以，我們到今天，不會把記錄形成知識，不會從知識形成文明。這個紀錄的難。是因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，我們不會這樣過日子。從現在開始做一些改變，在某一個角度，要開始重視，某一種支配的基礎在哪裡。譬如有些基本的東西，是靠整個社會的記錄。這個記錄，提供社會超越一個個人連帶的可能性。超越一個人際關係的可能性。否則，我們永遠要回到人，一個回到人，要建立系統是很困難的。

四、西方信用文明的創造：技術知識與社會知識的整合

在中國這個社會的文化脈絡中「債」這一個觀念，是把它放在一個道德的範疇來看待。如果這樣，我們會有一個問題產生，當債是放在道德範疇，經濟範疇

如何給他一個比較正向的，或是比較中性工具的界定呢？這就是我們今天在面對一個債這一個觀念的時候，受到文化很大的限制。是以，在不同的社會與文明中，怎麼樣去界定債牽涉到整個經濟生活的圖像。把債放在一個道德範疇的時候，就已經意味著，在生活中開展的方向，是完全不一樣。從這個債的觀念出發，我們很難發展出西方意義下的「信用」。那麼什麼是信用？本文認為信用是債在經濟範疇的表達形式，代表可再未來實現的一種無形資產，一種對未來使用資產的權利。我們每一個人面對生活的過程中，多多少少都在面對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就是：不管哪一個文明，都一定要面對一種可在未來實現的無形資產。而西方竟然從債反轉出一種正向的意向，信用。所以，如果從這個觀點來講，西方信用的創造，變成是經濟具有全球支配力的源頭。西方的信用，已不是在道德範疇之內，而是在經濟範疇發展，脫離了社會給它的束縛。英國十七世紀的全球貿易的成功，恰恰是從這個債轉成信用的過程中，以信用征服了全世界。

英國在十七世紀全球的貿易競爭，真正成功的地方是它發明出一個長期信用的技術（long credit）。就貿易而言，三個月是一般所謂信用期票往來的基本單位（陳介玄,1995）。如果一個月內就比較像現金了。如果英國給客戶的匯票可以到一年半的期限。等於客戶收了英國供應商的貨品，一年半以後才給錢。Olegario在其信用文化一書裡討論英國的故事，精彩的地方是在於，英國怎麼樣那麼大膽，它敢用一個「長期信用」（long credit）經營貿易。英國成功的秘密到底在於它竟然敢用一個 long credit，在全球的長程貿易勝出。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。一個社會的金融系統、社會系統，如果不夠成熟，怎麼敢把信用線放的那麼長？當你把它放的那麼長，資本是否可以回收？而在這麼長的時間，如果沒有營收廠商如何繼續生存？所以，從這個地方，我們看出英國信用經濟發展，背後技術知識的成熟發展，那就是英國資本市場、貨幣市場、貼現市場，在技術上的成熟發展。

英國長期信用背後的基礎是，其資本市場、貨幣市場和貼現市場，一定要很成熟，才能支持「長期信用」策略。舉例而言，英國供應商的買主開出一張匯票給他，這張匯票一年半以後，供應商才能去兌現。但是，在英國成熟的貼現市場、貨幣市場及資本市場發展下，供應商可以拿著國外買主給他的匯票，放到貼現市場來貼現，在貼現市場的貼現取得現金之後，英國供應商可以同時把這個錢放到貨幣市場，也可以放到資本市場去投資，取得一定的投資收益。相對於十七世紀中國的金融發展，跟西方的差別已經是越來越大了，中國如果沒有發展出一個好的資本市場，沒有一個好的貨幣市場，沒有一個貼現市場的話。所有的商人，是靠自己的資源在使用信用，這真的是不一樣的故事。所以，回到前面討論的一個重要觀點，金融的運作，一定要擺脫道德範疇，回歸到經濟範疇才有辦法，突破社會及文化脈絡所帶來的限制。是以，從英國十七世紀的發展來看，整個信用體系，不能孤立，必須跟金融系統結合起來。所以，英國會超越荷蘭、超越法國，

和其他義大利城邦。是因為，它用了這一個長期信用的策略，一下子建立了其全球的貿易網絡。

英國長期信用這一創新，幫它創造了一個具競爭力的全球貿易網絡。如果法國給這些北美的新移民，是三個月的信用，英國給你一年、一年半的信用，你要跟誰做生意？當然跟英國。所以，在這個時候呢，英國用這一個無形的資產，為它整個國家創造一個全球貿易網絡，這是英國優越之處。英國的謀略是，利用長期信用創造出類似「創投」的資本效果。在這個策略下，它很容易給新進入者機會。換言之，它在進入全球貿易網絡的時候，勇於培養網絡。用長期信用來培養網絡，這是英國一個非常獨特的策略。那麼，在這一個策略的過程中，英國所開啟的這一種所謂金融上的一個技術資產是什麼？利用信用創造貿易網絡過程中，英國這個技術資產完全為美國這個新的經濟體所吸收。美國的貿易商不但學習了英國長期信用的策略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們把信用當成一個產業來發展，形成了民間「信用報告公司」的出現，帶動了信用經濟技術運作上的革新。

信用的發展，英國率先打了一個基礎。到了美國以後，信用的重要帶動了產業對於信用報告的需求。對於交易主體各方信用資訊掌握的重要，使透明度（transparency）這個概念，變成是一個文化概念。這一個概念在現實上太難操作了。要它透明化，便要有一個機制，這一個機制的建構，是一個社會工程，怎麼得到呢？所以，美國把信用發展成一個信用報告產業（credit report agency）。這個發展，已經超越英國了。美國，用這個一個產業發展，它為了賺人家的錢，所以，提供的信用資訊要不斷地提升。Olegario 指出，不是政府的規範，而是市場的競爭帶動了這個產業的發展。美國銜接英國金融文明的過程中，卻在金融產業本身發展的同時，帶動了金融知識產業的發展。這在信用報告公司的出現看得很清楚。

最後一點我們想談的是，不管是經濟行動還是道德行動，都要面對社會從文化給予的正當性檢驗。文化正當性的檢驗，檢驗什麼？檢驗到底社會是支持或是拒斥。如果信用得到整個社會的支持，那信用會變成一個文化。如果社會是拒斥的，那信用會被打入道德的範疇，永不得翻身。社會會對它保持距離，以策安全。我們不太容易鼓勵我們的下一代去借錢，去創造他的信用。道德拒斥這一條路。所以，當西方信用變成文化的時候，代表西方的金融文明，對於債(debt)跟信用(credit)賦予一個非常正當性的地位。在經濟上，賦予它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。從這個地方，大家可以看到，任何經濟生活最後走到文化範疇的界定，絕對不是那麼簡單。中間要經過非常技術本質的發展。沒有經過這個技術的考驗，事實上是很難過渡到一個社會知識的。所以，技術知識與社會知識兩者有一個相當程度的辯證發展過程。金融社會學的觀點告訴我們，不能忽略了金融觀念與行為中間發展的過程。因為過程說明了技術知識，從英國到美國如何一步一步推出它的力

道，使得整個社會，開始從文化上去體會它、去建構它，乃至於去正當化它的這一個過程。

五、小結

債到信用的轉化，是一個牽涉到西方金融文明發展的內在核心議題，我們在本文只是初步的探討。國際金融的發展是一個超越主權邊界的歷史過程，也是一個超越知識邊界的認知過程，債到信用的轉化是這個雙重過程的核心轉折點。每個社會對於債的界定，恰恰反映出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的全貌。債如同一個歷史照妖鏡，把每個社會的長處與短處，透過它的反射，毫不保留的呈顯出來。西方金融文明的核心，就在於對於債的界定，與其他文明逆向操作，朝不同的方向前進。不只在金融及經濟上，將債看成是信用，也在文化上及道德上，將債看成是高貴的行為尺度。這就使西方的金融走向一個沒有文化羈絆的制度創新，不斷在技術知識的發展上，帶動社會知識的發展；同時反過來，也在社會知識的支持下，技術知識有不斷創新的可能。所以，金融技術知識能發展多遠，要看社會知識的臉色。社會知識沒有金融技術知識的落實，也不足於成就一個文明。

債之所以重要，乃在於債不只是債，債是一個千年社會如何從傳統走向現代的一個指示劑。不同時代對待債的方式，說明了那一個時代歷史的標記。西方證券市場的千年發展，說明了債的發展一開始就有超越傳統的潛力。因為長程貿易的商人及金融家，已打造好幾個金融市場，等著大展宏圖。債在這些布勞岱宣稱的資本家手中，變成是資本的工具，用超乎俗想像的知識，在國際場域呼風喚雨。這是一個歷史的諷刺，同樣一個工具，卻輕易的分出不同階層的人，有的在資本主義的上層，有的卻在日常生活中打滾。這其中的差別，並不是資本而是知識。沒有知識也就沒有反轉債的可能。作為一種最平庸的生活工具，債對每個人發出挑戰，看你用什麼知識對待它。我們從千年金融史學到最多的一課是，西方領先關鍵的一部分，來自於率先於其他文明認識了債的經濟範疇之意義，而不被社會中的道德範疇綁住。這是文化支配力最幽微的表述，使每個人都無意識的接受了這個支配。所以，西方文明仍然遙遙領先我們，因為債的文化支配，仍然緊

緊的咬著我們這一代和我們的下一代不放。沒以深透的金融知識，這個文化支配力之驅除，幾乎不可能。這是本文研究債的關懷所在，希望這個起點導向更深入的研究，有助於整體金融知識的提升。

參考書目

- Carl Wennerlind, 2011, *Casualties of Credit: The English Financial Revolution, 1620-1720*.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.
- Carruthers, Bruce G, 1999, *City of Capital: Politics and Markets in the English Financial Revolution*. New Jersey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.
- Dickson, P.G.M, 1993, *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: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redit 1688-1756 : Gregg Revivals*. Aldershot ; Brookfield Vt : Gregg Revivals.
- Donald MacKenzie, 2008, *An Engine, Not a Camera: How Financial Models Shape Markets*. The MIT Press.
- Emile Durkheim , translated: W.D. Halls, 1984, *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*. New York Free Press.
- Gerald D. Suttles, 2011, *Front Page Economics*.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.
- Gerald F. Davis, 2011, *Managed By The Markets: How Finance Re-Shaped America*.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USA; Reprint edition.
- Greta .R Krippner, 2012, *Capitalizing On Crisis: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Rise of Finance*.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.
- Karin Knorr Cetina and Alex Preda, 2012, *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Finance*. Oxford University Press.
- Mary Poovey, 2008, *Genres of the Credit Economy: Mediating Value in Eighteenth- and Nineteenth-Century Britain*.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.
- M. T. Clanchy, 2013, *From Memory to Written Record England 1066-1307*. Wiley-Blackwell Press.

Ranald C. Michie, 2008, *The Global Securities Market: A History*.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USA.

Rowena Olegario, 2006, *A Culture of Credit: Embedding Trust and Transparency in American Business*.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.

Timothy J. Sinclair, 2005, *The New Masters Of Capital: American Bond Rating Agencies and the Politics of Creditworthiness*.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.

陳介玄，2012，〈流動的國界：境外金融興起及其歷史意義〉。論文發表於「第六屆金融、技術與社會學術研討會」。台中：東海大學社會學系。

陳介玄，2013，〈歐洲美元的制度創新與場域革命：民族國家國際金融的結構轉型〉。論文發表於「第七屆金融、技術與社會學術研討會」。北京：北京大學社會學系。